



弱势群体价值观教育在媒介中的 声音与形象

—— 基于对《中国德育》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

□ 王 熙 王怀秀 邵 颖

〔摘 要〕 当代教师对价值观教育的理解并非先天固有，而在很大程度上经由媒介的意义建构。研究针对《中国德育》这本面向全国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德育专业期刊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德育》近五年来所发的各类文章中只有很小一部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随迁子女，更少涉及少数民族学生、贫困学生和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形象塑造上，为数不多的有关弱势群体的文章大多仅从“关爱”的角度阐发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内容与方式，较为单一地将留守儿童与随迁子女塑造为被关爱的对象。基于这样的媒介建构，针对弱势群体的价值观教育可能会滑向社会关注力的边缘，并被刻板化、孤立化。

〔关键词〕 价值观教育；弱势群体；公共媒介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相关教育实践与研究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承袭我国的“大德育”传统，将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公民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包容在内。这种以“价值观教育”统领各层次、各领域之价值的做法在英、澳及北欧等地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十分常见^[1]。本文也正是在最广义的层面上采用“价值观教育”这个伞形概念。

在探讨价值观教育的原则时，沈湘平借鉴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中国儒家思想指出，教

育者应正视“现实的人”，承认并尊重其主观意义世界，融入它，进而提升它^[2]。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任何个体都负载着阶层、民族等社会套印，都属于特定社会群体，浸润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贯彻价值观走入现实之人，就有必要对“那些以抽象面目、匿名方式出现的‘群众’‘大众’‘人们’展开进一步分层、分类、分群的切实和细致的研究”^[3]。由此，有关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不能停留于针对抽象之人的哲学思辨，而须直面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哪个社会群体占有更多的资源？哪个群体有能力发出更大的“声音”？哪个群体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城乡与地区差距，社会阶层分化愈发引起关注，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被视为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价值观教育更不可能避开社会阶层问题，尤其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境况。弱势群体是指在现有情况下失去或减弱了获得按社会平均观念本应享有的权利或应具备的能力的人群^[5]。作为一个相对的，带有比较性的概念，弱势群体很可能在不同时空指向不同的人群。当前我国教育研究领域所谈的弱势群体比较集中地指向农村留守儿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贫困家庭学生、残障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

有关弱势群体的价值观教育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盲点，尽管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也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西方学者要么借助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个体的道德发展过程，要么基于价值哲学理论对价值观教育的应然状态进行思辨。社会学视角的缺失致使有关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与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态及其文化

的研究（如少数族裔文化、劳工阶层文化、青年亚文化等）相互脱节^[4]。

在谈论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时，我们需格外关注一线教师的观点。在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正如伯明翰学派的名言：“普通人不是文化白痴”^[6]。价值观的诠释与思考不可能再被少数专家学者垄断，每一位教师都是参与价值建构的积极主体。在价值观教育领域，教师在怎样的程度上关注弱势群体，具体关注哪些方面，这些都会影响到教师对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把握，都会对具体的教学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相较于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而言，一线教师对价值观教育的理解可能缺乏理性与系统性，但这些零散的、非理论化的观点正是促成当今价值多元图景的重要力量，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强调教师作为价值意义之建构的主体时，也要意识到教师作为公共传媒之消费者的身份。任何一位教师对弱势群体的印象并非先天固有，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宏、微观社会情境的建构，其中公共媒介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李普曼指出，生活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可能亲身感知到所有与其相关的所有事物，只能通过信息供给机构——公共媒介——去了解^[7]。在说明公共媒介对于个体及社会观念的重要意义时，哲学的“语言转向”提供了有力的路径。这一转向强调语言及其他符号并不是在单纯映照外界事物，而会积极参与到社会现实（包括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社会价值等）的建构过程中。正鉴于语言的建构性，公共媒介是塑造社会群体形象的重要力量。当然，这种形象建构不是简单的“照相机成像”，而是基于媒介的理解与偏好为特定社会群体的身份编织意义的过程，这里很可能存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意义筛选”与“加工”。社会公共媒介在当今社会所发挥的重要社会影响之一就是通过重复建构这种带有选择性的意义解释,形成社会的系统化态度倾向(包括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印象),从而建构整个社会德文化资源库^[8]。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公共媒介具有为社会群体“赋予地位”的功能^[9]。鉴于公共媒介的价值建构功能,本研究聚焦一份教师日常较易接触的媒介文本,一是看它到底在怎样的程度上关注针对弱势群体的价值观教育,二是看它具体的关注角度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要了解教师群体对弱势群体所受价值观教育的关注程度以及关注视角,本研究针对《中国德育》这本面向全国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期刊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之所以选取《中国德育》这本期刊,一是因为它的专业性,二是鉴于它在教育实践领域的影响力。首先,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德育》属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会刊,是基础教育层面德育及价值观教育领域的专业性刊物。其次,尽管《中国德育》尚不属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力有限,却首批入选《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目录》,同时入选龙源数字阅读影响力前100名期刊。龙源期刊网根据阅读量、付费量、地域、时间和类别对我国4200多种人文大众类期刊杂志做出前100名的排行。该排行榜已经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业、期刊杂志业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事件。可以说,这本面向全国发行的期刊在基础教育实践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一线教师、学校管理者和基层教育行政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最容易接触到的期刊之一。基于“大德育、低重心”的定

位,在“学术”板块之外,《中国德育》还设有比较通俗的“讲堂”“观察”和“话题”等栏目,以及旨在介绍和探讨区域与学校德育实践经验的“第一线”“样本”与“名校上榜”等栏目。

研究将《中国德育》2013至2017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发表的1970篇文章(除去通知、声明、政策转发类文章)作为资料,一是采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对标注关键词的学术型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探讨与弱势群体的相关的词汇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二是对介绍及分析国内及国外案例的论文(包括2016、2017年的“第一线”和“样本”栏目,以及2013至2015年的“第一现场”“区域报道”和“名校上榜”栏目)进行内容分析,计算有关弱势群体的文章所占比例;三是聚焦有关弱势群体的案例文本,探讨其呈现弱势群体形象的具体角度。前两个方面的证据可用于探讨弱势群体经由媒介发出声音的大小,第三个方面的资料可用于分析弱势群体的形象建构。

三、研究发现与讨论

1. 《中国德育》中弱势群体的“声音”

根据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德育》2013至2017年所发447篇学术及时评类文章中,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关键词仅有红圈标记内的“留守儿童”(19次)、“教育公平”(9次)、“随迁子女”(8次)、“乡土文化”(7次)和“乡村教师”(6次)。

这些关键词对应节点的“引文年轮”基本对应图中上方“时间色谱”中2013至2014年的时间灰度,说明在最近两年中的研究热



图1：《中国德育》中学术型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2013—2017年）

度出现降低趋势。此外，这些节点的中介中心性——在共现网络中的节点间最短路径上出现的频次——都很低，这说明它们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这些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连线也不够丰富，可见它们与其他词汇共同作为关键词出现在论文中的机会非常有限。这就是说，这些针对弱势群体的学术型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孤立与封闭的，其主题很少与其他德育及价值观教育领域的其他议题（如心理健康教育、校园文化、核心素养等）发生联系。

作为贴近基础教育实践的期刊，《中国德育》刊登大量的案例文章，基本上由一线教师及校长所写。这批文章包括在2016至2017年“第一线”和“样本”栏目，以及2013至2015年的“第一现场”“区域报道”和“名校上榜”栏目的1309篇文章。相较于学术型论文，这批案例文章更接近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通过整理文章作者的单位，研究发现，作者来自特殊教育学校的文章仅有3篇；作者来自少数民族学校及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文章仅有10篇(其中明确谈及学生民族

特点及相应教育特色的文章仅有4篇)；作者来自镇及以下普通中小学的文章为63篇。在这63篇文章中，并非泛泛谈论教育理念，明确指出本校学生群体主要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文章有40篇；指明学生群体主要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文章有19篇。如图2所示，自2013年，《中国德育》每年发表的有关这两类弱势群体的文章都不足文章总数的百分之八，这个比例远远低于留守儿童及随迁子女在实际人口统计中所占的比例。根据段成荣等针对全国第六次人



图2：不同群体的案例文章所占案例文章总数的比例（2013—2017年）

口普查数据的细化调查,截至2010年,全国0~17岁的留守儿童有6972.75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规模6102.55万,并且有大规模增加的趋势^[10]。根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394.7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6.71万人,在初中就读358.06万人。由此可见,在《中国德育》所发的文章中,弱势群体所在的学校明显缺乏发声的机会。我们可以推断,一线教师们在学习有关价值观教育的文章时,极少有机会了解到有关弱势群体的境况,因而较难形成对这个群体的关注。

《中国德育》也会刊发一些介绍和分析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文章。在2013至2017年期间,共有42篇文章探讨别国的宏观政策、教育理念及全国或地区范围的大型实践活动(如美国多个州实施的生涯教育等)。在这些文章中,分别介绍美国、日本、英国及综合介绍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章较多,但其中仅两篇谈及教育均衡问题。此外,在这42篇文章中没有一篇谈及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情况,甚至跨国比较的文章也没有谈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选定的这段时间内,另有16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国外个体学校的相关实践经验,其中以美国学校为案例的多达12篇,剩下的4篇也没有一篇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学校。这16篇案例均不涉及弱势群体。基于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推断,由

《中国德育》传播的海外经验也很少带来弱势群体的声音。教师读者接触到的海外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偏城市化、精英化。

2.《中国德育》中弱势群体的形象建构

弱势群体在媒介中的形象建构依靠话语的“呈现”意义(Representation),重点是看文本述说概念、表达意义的角度。根据社会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N)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话语分析策略,“呈现”的关键是看文本如何通过遣词造句等语言形式特征来建构意义^[11]。所以,研究借助对词汇及句式的分析的方法探讨前文所述的59篇文章(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40篇文章和针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19篇文章)的形象建构。

在这59篇文章中,54篇采用了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表述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的特点。研究对这些形容词进行分类,并统计各个类目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见表1)。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学生因家庭教育的缺失,在学习上遭遇困境,在心理和行为习惯上也出现不少偏差。这些研究均无指明其判断的依据,但可以推断作者是参照优势群体的特点进行的负面评述,甚至有两篇文章提出让这些学生也能做“小绅士”和“小淑女”的口号。对于这样的“问题”孩子,不少研究推崇以关爱为主题的教育,有7篇文章在题目中出现“爱”字,如“让这里的教育充满爱”“关爱,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

表1:案例文章中有关留守儿童与随迁子女的形容词类目出现频次

形容词 词汇 类目	心理问题(如 自我中心,缺 乏感恩之心 等)	不良行为(如 撒谎、欺负同 学等)	学习困难 (障碍)	(家庭) 环境不良	厌学	不良 习惯	仪态 品味差	身体 素质差	道德 品质 有问题	家境 贫寒
出现 频次	6	5	6	5	3	7	1	1	2	3

入城市”等；20篇文章中所谈的具体学校实践打出了“以爱育爱”“亲情唤醒”“感恩你我”等口号，或列举“爱心超市”“亲情对对碰”“学会感恩”等学生活动。在描述学校的各种教育行动中，有关“爱”“亲情”“感恩”“温情”“心灵”的表述高频出现。在彰显爱的教育中，教师自然而然地担当起家长的责任，如“老师就是你的家长啊”，“教师似家长，为留守儿童创建温暖的家”这样的表述。出于这些担负起家长责任的教育者之口，以“给留守儿童一个温暖的家”，“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天”“为孩子的心灵打开一扇窗”等句式为标题的文章多达9篇。在所有相关的59篇文章中，以类似表达方式陈述学生活动及学生管理之目的的情况也十分常见。相对于教师作为“施予者”的主动角色，学生通常被描述为被呵护、被温暖、被感化的对象。例举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等方面的文章仅有3篇。

在词汇分析之外，研究对有关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的59篇文章的内容进行类属分析，统计每个类属的出现频次。如图3所示，学生活动、家校关系、师生关系、学生管理这四个类属的出现频率较高。结合这些文章所塑造的群体形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进行诠释：作为关爱的主体，一方面，尽心尽责的校长与教师们积极组织学生活动，注重学生的日常管理，特别强调对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矫正；另一方面，校长与教师格外重视家校关系，在现有条件下积极组织亲子共读活动，并积极开展家访，以此弥补学生在家庭教育及亲情方面的缺失。除此之外，在这59篇文章中有7篇文章以乡土文化教育为主题。有关文章内容的类属频次统计中也出现过8次乡土文化教育及4次红色革命传统教育。一些从乡土文化和周围社区文化中积极

挖掘出来的教育资源构成了课外活动及校本课程的主题。不过这类文章为数较少，影响力相对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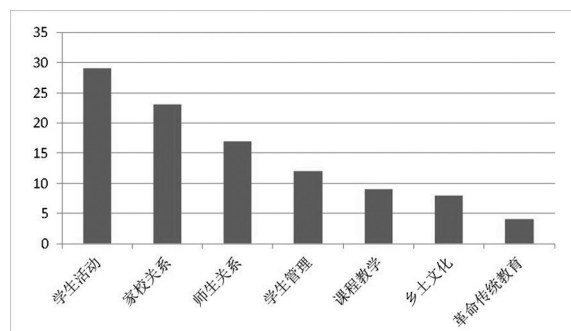


图3：案例文章中内容类属的出现频次

总体来讲，弱势群体在《中国德育》中的形象比较单一，是被关爱的对象。尽管对于缺乏亲情爱护与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及随迁子女来讲，来自教师与学校的爱护是必须的，但作为价值观教育的手段而言恐怕并不充分。与普通城市学校的学生一样，这些孩子的“价值观念、价值态度与情感、价值理性、价值信念和价值行动力”^[12]都需要逐步养成与发展，一线教育工作者除施予关爱之外，还应积极思考他们具有怎样的心理发展特点，拥有怎样的家庭文化资本，学校可以争取到哪些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教师可探索如何以适切的方式引导、辅助学生的发展，保护学生发展的自主性。此外，从媒介影响的视角出发，长期、反复地在受众面前以单一角度描述每个群体的形象，有可能形成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就是“一种简化或类型化的认知方式的结果”^[13]，这种一刀切式的认知方式容易导致人们的认识僵化，停滞。更何况，文章中大量使用的“不良”“困难”等贬义词汇容易使媒介受众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趋于负面——“问题孩子”，进而产生“异己”的负面身份建构。

四、结语

《中国德育》近五年所发的文章，无论是学术探讨、国际比较，还是案例分析，都只有很小一部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随迁子女，更少涉及少数民族学生和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可以说，弱势群体通过这份专业且受众颇广的媒介发出的声音相当微弱。在形象塑造上，这些为数极少的针对弱势群体的文章大多仅从关爱的视角阐发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内容与方式，较为单一地将留守儿童与随迁子女塑造为被关爱的对象，将学校描述为充满温馨的家园。尽管这个群体的成长的确需要更多温情，但单纯强调关爱有可能不断强化这个群体的“问题”“可怜”的负面刻板印象，进而将这个群体所接受的价值观教育“特殊化”，从所谓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教育中被区分出来，甚至成为一个没有用道德与价值观教育理论充分解释和审思的“个别现象”。

价值观教育需要以人为主体的，这里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而是生活于社会文化群体中的鲜活个体。教育者对“人”的形象把握离不开公共媒介的话语建构。如果公共媒介不能充分地为弱势群体发声，不能理性地塑造他们的形象，那么广大受众对价值观教育的理解就会局限于城市精英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线教育工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印象有可能在数量上偏离实际地少，同时也有可能形象上刻板地凸显“可怜”。而对于这些“为数甚少”的“问题学生”，教育工作者似乎只需付出爱心，无需进行更多的理性思考与研究，无需发展学生的自主性。而对于那些直接接触弱势群体的教育工作者来讲，身处社会关注力

的边缘，他们很可能丧失对自身工作的兴趣与信心，或是盲目照搬城市精英的做法。在文化研究领域，赵勇曾借用童庆炳先生的比喻——“只关注二环路以内的问题”——来批评该领域的城市化与精英化取向^[14]。根据赵勇的解释，北京的二环路以内是各方社会精英的云集之地，“二环路以内”的文化研究仅关注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文化，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精神世界。研究者认为，这个批评同样也应为价值观教育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拉响警钟。

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仅着重分析媒介文本呈现了什么，基本上是通过媒介的意义建构来推测受众（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所感所想。后续研究可采用问卷或访谈资料等实证数据进一步揭示受众的主观世界，毕竟，读者不是简单的信息容器，他们会根据自身的经验与偏好对媒介文本的意义进行再解读。此外，本研究尚未追问这种选择性的媒介报道与包装背后的话语动机。媒介之所以不关注或窄化地关注弱势群体的价值观教育，是否因为大众（甚至包括弱势群体自身）在选择所谓的“好理论”“好经验”时不自觉地戴上了“有色眼镜”，这个问题需要把有关媒介文本的分析放置在更广泛的话语实践中，也就是文本的社会生产、消费和分配中加以考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路径、方法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JZD001）的研究成果。】

王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王怀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邵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弓立新

（下转第62页）